

# 《诗经》成语的文化阐释

瞿继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内容摘要】成语是文化与语言精淬出的文字艺术,能够言简义赅传达诸多幽深曲折的意思,并以其经典概述给予我们厚重的文化沉淀。《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既是一部文学宝典,也是一座语言宝库。《诗经》中的成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透过这些成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生活与精神家园。

【关键词】成语 婚恋 民俗心理 生活态度

中图分类号:J20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12-0093-03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一个民族世代沿袭下来的符号体系,承载着这个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一个民族所有的文化特性都根植在自己的语言中,成为这个民族的灵魂与血液。成语作为文化与语言精淬出的文字艺术,往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反映出文化的多层次样貌与深层意蕴,是文化的沉淀与结晶,也可说是语言与文化的“活化石”。李大农先生认为:“成语比一般语汇更能完整地表现出汉民族的文化内涵。”<sup>[1]</sup>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对于我们考察周代的社会制度、先民们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心理情感等层面的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那些源自《诗经》,为我们现代人使用的成语,如“投桃报李”、“窈窕淑女”、“战战兢兢”、“高山仰止”、“暴虎冯河”,也承载着那个时代丰富的文化蕴含,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探寻《诗经》成语的文化蕴含,有助于我们了解周代社会的文化生活形态与精神家园。

## 一、婚恋生活

婚姻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关系着一个宗族、一个族群的生死存亡。周代已经把婚姻视为国家大事而加以高度重视。《诗经》中有大量关于恋爱方式和婚俗的描写,这些都在《诗经》的成语中得以保存,藉此我们可以考察周代的婚恋生活,了解中华民族婚恋礼俗的起源与传承。

一般而言,周代实行的是聘婚制,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谓“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sup>[2]</sup>因此《齐风·南山》讲:“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卫风·氓》也说:“匪我愆期,无良媒。”如果婚姻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势必“父母国人皆贱之”<sup>[3]</sup>。虽然对于婚姻,周代有着严格的规定,要通过一定的程序,举行一定的仪式,方可称得上明媒正娶。但当时男女间的恋

爱也有自由开放的一面,在周代民间也存在着一种男女自由恋爱、自由择偶的婚俗。作为一个农业社会,为着族群与社会的发展,周代非常重视婚姻,官府还规定了男女的适婚年龄,如《周礼·地官·媒氏》讲:“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对于那些到了适婚年龄仍未嫁娶者,政府责成官媒在仲春之月,安排他们相会来寻找伴侣。《周礼·地官·媒氏》上讲:“令男子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而无故不参加的人,还会被处罚。但如果在相会时遇上了情投意合之人,即便是私奔也不会受到处罚。在男女欢会中,遇到情投意合之人,便少不了通过赠物来表达爱慕之情。由于欢会常常在水泽、山林边举行,故此两情相悦的男女恋人就地取材,采摘花草瓜果,或解下自己所佩的器物相赠以示爱意。这种求爱方式在《诗经》成语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桑中之约”、“投木报琼”、“采兰赠芍”等。“投木报琼”源出《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定情的诗歌。在仲春之月的欢会上,女子采下瓜果向心仪的对象掷去,而被掷中的男子如果解下身上的玉佩回赠,就表明两人恋爱关系的确立,即私定了终身。这里的瓜果、玉佩显然已经成了两人相好的定情之物,承载着浓浓的情意。闻一多先生认为女子用瓜果作为求偶的媒介,是“取其蕃殖性能之象征意义。掷人果实,即寓贻人嗣胤之意,故女欲事人者,即以果实掷之其人,以表诚也。”<sup>[4]</sup>“采兰赠芍”源出《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仲春之会的欢乐情景。溱水、洧水河边,男女青年嬉戏打闹,场面欢快,气氛热烈,而那些情投意合的恋人,相互赠以香草表达爱意。“兰”即兰草。兰草、芍药这些香草在古代常常代表着情操的高洁,男女恋人用香草相赠,既表达了对对方的爱慕,也喻意他们高洁的爱情。“采兰赠芍”这一成语也就用来表达青年男女

\* 作者简介:瞿继勇(1970—),男,吉首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

两情相悦,互赠礼物以示心意的意思。但对于诗表达的内容,后世的一些学者却大加斥责,郑玄认为是“淫风流行”,朱熹认为是“淫奔者自叙之辞”。他们用封建礼教作为评判的标准,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在当时那个时代,这种男欢女爱不但不受指责,反而是受到礼制风俗的促进。

周代社会恋爱虽比较自由开放,但婚嫁却一定要遵循适当的仪式,经过一定的程序方可。其中最重要的婚嫁礼仪就是肇始于周代的“六礼”,即《仪礼·士昏礼》中所说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项仪式。《诗经》中反映婚嫁礼仪相关的成语,如“文定之喜”、“于归之喜”等。“文定之喜”源出《大雅·大明》:“大邦有子,俎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诗中描写了文王按照纳吉、纳征、亲迎的礼仪迎娶莘国的女子太姒。“文”,礼;“祥”,吉。“文定厥祥”是说通过占卜得吉后,行纳币之礼来定下结婚的好日子。故此“订婚”后来又称为“文定之喜”。“于归之喜”源出《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一首祝贺年轻女子出嫁的诗歌。诗人用桃花的艳丽来比喻新娘的美貌,以“宜其室家”来形容新娘品德的美好。“之子于归”是说这个年青的女子要出嫁了,古时称女子出嫁为“归”,因为古代社会男尊女卑,古人认为夫家才是一个女子的真正归宿。后来,人们把“之子”删去,又在“于归”后面加上“之喜”来表示女子出嫁之喜,“于归之喜”也就成为了人们祝贺女子出嫁的婚嫁贺辞。

透过《诗经》中的成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在周代社会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欢快聚会的生活形态,也可以看出古人重视婚姻礼仪,以及贺婚成俗的文化意蕴。

## 二、民俗心理

《诗经》可以说是周代社会的一部“史诗”,真实地记录了周代先民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信仰。对祖先的敬奉,对家庭血缘的注重,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诗经》中的成语也自然记载了这些文化内涵,表现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先民们对于繁衍子孙的重视,对于多子多福的期盼,这一文化心理千百年来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诗经》中相关的成语,如“瓜瓞绵绵”、“螽斯衍庆”、“麟趾呈祥”等,都表现出周人希望人丁兴旺的心理。“瓜瓞绵绵”源出《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诗篇歌颂了周代祖先公亶父带领周人迁往岐下周原建立国家,并为文王之兴奠定基础的英雄事迹。“瓞”指小瓜,瓜类植物的枝叶能攀爬延生,诗人借以比喻周代子孙绵延不绝,现在人们主要用来祝贺子孙日盛。“螽斯衍庆”源出《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是一篇祝贺他人多子多孙的诗歌。“螽斯”大多学者认为是蚱蜢,它生殖力强,常成群成群一起觅食。诗以螽斯作比,喻其多子兴旺之意。后来“螽斯衍庆”也就成为了颂祝他人多子多孙的贺词。

中华民族此种“多子多福”的心理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心理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宗法制度息息相关。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周代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在农业生产技术低下、农业生产任务繁重、自然灾害频发的现实面前,增加劳动力就成了先民的必然选择,因此,周人对于繁衍后嗣特

别重视。另外,周代的宗法制度非常注重血缘的亲疏,它关系着权力的继承、财产的分配。因此,上至天子王侯,下到平民百姓,无不对血脉的承继高度重视,都希望自己的血脉能绵延不绝。

## 三、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

每一个民族都基于自身特定的历史人文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反映了特有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诗经》中的成语就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周代先民们的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并影响久远,积淀为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民族性格。在《诗经》成语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内省法则与忧患意识。

内省,即指一个人要从内心省察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没有过失,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说每天要检查自己的行为,并有所反省。不难看出,内省法则讲求的是通过个人的自律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这种法则被儒家所倡导,强调“文治教化”、“以文教化”、“人文化成”,长久以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诗经》中相关的成语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忮不求”、“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源出《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一首女子夸赞其意中人的诗歌,诗以淇水旁竹美比兴人物美好,极力夸赞她意中人。切,古时称加工骨器为切;“磋”,加工象牙称磋。“琢”,加工玉称琢;“磨”,加工石称磨。“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喻指意中人不断修养,使品德更美好。“不忮不求”源出《邶风·雄雉》:“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这是一首描写女子思念远役在外的丈夫并盼其早归的诗歌。诗人以孤飞的雄雉起兴,以比其夫离去。“忮”,害、嫉妒之意;“求”,贪求之意。“不忮不求”后多用来形容淡泊无求,不为非分之事。

忧患意识是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也是历代文人在国家危亡之时产生责任感的源头。“忧患”二字始见于《易经·系辞下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sup>[5]</sup>相传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时候,心中非常忧虑,故而演《易》以探析世间万物的变化。现代学者徐复观对“忧患意识”的内涵曾作过精辟的阐述:“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一般人常常是在恐怖绝望中感到自己过分地渺小,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一凭外在的神为作决定。在凭外在的神为自己作决定后的行动,对人的自身来说,是脱离了自己的意志主动、理智导引的行动,这种行动是没有道德评价可言,因而这实际是在观念的幽暗世界中的行动。由卜辞所描出的‘殷人尚鬼’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的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sup>[6]</sup>周立国之初,正逢殷末危乱之时,文王处境凶险,因此产生这种人文精神的自觉,并为后来的周公、召公所承继,而“忧患意识”也成为了周代最为鲜明的文化特色之一。《诗经》中相关的成语如“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忧心如焚”、“殷鉴不远”、“未雨绸缪”(下转第105页)

所以高明之道还要回落到人间。庄子处于一个权谋狡诈的战乱年代,无辜者惨遭杀戮,社会犹如陷阱一般,庄子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但又是不得不面对的。庄子的逍遥游和齐物论可称为脱离人间的道,而人间世则是不离人世的道,只有回归人世,庄学才能面对世间种种苦,而开出解脱之道。

人间世描写了三种人,一是汲汲于追求用世,希望跻身政治的人,这以颜回为代表。二是已经跻身政治的人,以叶公子高和颜阖为代表。三是脱离了政治获得解脱之人,以南伯子綦、支离疏、楚狂接舆为代表。这恰是一个渴望政治到在政治中饱受煎熬到解脱的一个过程。

庄子在面对人世时必须把逍遥游和齐物论中的大道应用到现实世界帮人们解脱。如何寻得解脱之道呢?

其一,未跻身政治之人。颜回将见卫君,请别于孔子。孔子对颜回描述了种种困境。颜回提出自己的决之道如“端而虚,勉而一”、“内真”、“外曲”“成而上比”等,都被孔子一一驳回。孔子教颜回以心斋。何谓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这是齐物论中讲的不用成心,顺任万物之自然的具体应用。若无名利束缚,便可因顺自然生活与大道为一,便回归了生命的本真。

其二,已跻身政治的人。叶公子高使齐,颜阖讲傅卫灵公太子,让人们看到政治给人带来的焦虑与困境。叶公子高说自己或不免于人道之患或不免于人道之患。孔子教他保持一颗平常心,既不溢美也不溢恶。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他处于一

种政治责任和保全生命的矛盾之中。蘧伯玉告诉他“戒之,慎之”,先要“心莫若就,心莫若合”学会外表迁就,内心和顺,还要掌握火候,做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既不一味迁就,又不同流合污。真是道出了人间的险恶,不得不说是一种无奈。

其三,摆脱政治之人。人间世如此险恶,庄子认为何必如此汲汲于政治,不如做一个无用之大用之人。借栎社树点出无用之大用,再借支离疏养终天年,让人们看到免于人间之害,不在于形而在于心的超越。最后借楚狂人之口,说出面对无道之世还不如隐退以求解脱。

庄子的《人间世》一篇,是庄子把大道用于人间世,在其中透显着无奈。面对人间险恶终有一种心灵的自由与身体不自由的内在紧张,在庄子这里似乎可以看到魏晋士人处于政治活动中内心的痛苦的挣扎。虽有高明的心境,然面对人间世终是不能完全摆脱,在经历了汲汲于世的迷茫和政治中种种煎熬,还不如选择退出以寄意山水、退隐山林,以逍遥人世。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庄子的生命取向是一种从尘俗超拔到天地宇宙境界来观看人间世,用道的观点使物各付物,回归生命的本真,同时一步步下落回归到人间世。不超拔出俗世不足以彰显道之高,不回归人世不足以彰显道之实,可以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但是儒家的取向同时也是庄子的取向。

参考文献:

- [1] 诸子集成(第四册).庄子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6.
- [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17.

(上接第94页)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源出《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中可见统治者昏庸无道,听信奸人诡计,摒弃忠言,目光短浅,不知国家危亡。诗人看到国家的危难,担心国家危亡,而朝中君臣却毫无所觉,因此心中深深忧虑,竟至“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三个成语都是形容诗人心中恐惧忧虑,故而行事极为谨慎。“忧心如焚”源出《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惓,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这是一首周朝大夫家父责备太师尹氏的诗歌。师尹位高权重,担当国家的大任,理应为天子与百姓尽心尽力,但他却滥用姻亲,败坏朝政,使百姓怨恨,我们可以想见诗人心中的愤怒与忧虑。“忧心如焚”形容内心烦恼有如火在燃烧一样。周代这种以人为主体的精神自觉,可以说是忧患意识的发端。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又对忧患意识的内涵作

了更深入的阐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sup>[1]</sup>孔子忧虑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合于义理,有了过错又不能改正,因此更加谨慎,并由此产生出“敬”的道德观念。孔子从自身修养出发,注重道德的进化,将忧患意识提升至道德层面,转化为“敬”的观念,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 [1] 李大农.成语与中国文化[J].南开学报,1994(6):68.
- [2] 班固.白虎通[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250.
- [3]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143.
- [4]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上海:开明书店,1948:143.
- [5] 唐明邦.周易评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242.
- [6]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见李维武,徐复观文集,2002:32.
- [7]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67.